

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全面展开。按照中组部领导的要求，今天，我就“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与大家作一点交流。主要是向大家汇报和学习。准备讲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历程

首先，什么是作风？如果下一个定义，可以说，所谓作风，就是一个党、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团体、一个人等等，在自己的思维和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作风表现于不同范围和群体，就有党风、政风、世风、民风、校风、家风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则有学风，文风，会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等。

党的作风，就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它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讲作风，道德是讲党风以及政风。党风、政风与其他方面的作风密切相关。世风、民风、校风、家风等等，都会影响党风、政风。但由于党处于领导地位，所以，抓作风，首先要从党风政风抓起。抓好党风政风，就能带动其他方面的作风建设。

90多年来，我们党大致经历了三个30年，办了三件大事。作风建设始终贯串其中，具体可分为六个阶段考察。其中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不断探索和解决作风问题，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

党的作风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往往以为是30年代之后才形成的。其实，应该说，党自成立起，就表现出了一些很好的作风。

比如说，以天下为己任，深入基层、组织群众，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等等。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地使用作风这个词，但这些精神和作风，在党的活动和工作中已经体现出来。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奠定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比如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 忠实。3.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 不吃鸦片，不赌博。”这几条，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赌博问题，2005年，17个省区市查处参加赌博的党员干部就有2635人。

随后，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党风”的概念。

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45年，党的七大总结作风建设的经验，明确地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归纳为党的三大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七大刘少奇同志同时还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深入的阐述。三大作风的文字表述后来有一些变化。我们现在说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二）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执政条件下的作风建设问题，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要求。1950年上半年，全党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下半年至1954年春，又进行了全党范围的整党运动。

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执政7年以及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

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等等。

但很可惜的是，这些要求没有能坚持下来。八大以后，由于“左”的错误不断发展，党的优良作风遭到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左”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歪风邪气盛行一时。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全面恢复优良传统，同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突出解决作风建设上遇到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大上概括了我们党的五个作风，即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要求继承发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转折。随之，恢复建设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十二大之后集中开展了整党工作。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党有针对性地反对不正之风，开展廉政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四）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江泽民同志对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针对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新情况，党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风建设的重点，强调反腐败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靠教育、又靠法制的思路，采取重大措施，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求领导干部讲

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此而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中央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使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五）新世纪新阶段，党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进一步开创作风建设的新局面

十六大后，胡锦涛同志带队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精神。

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执政为民、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建设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政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共产党人道德建设等。要求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特别是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对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十七届四中全会还要求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在实践上，用一年半时间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十七大后，又开展了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时，严肃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贪污贿赂的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制定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还逐步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六）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作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统领，对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部署。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求“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特别是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十八大后，中央很快就作出了关于作风建设的八项规定。此后在多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和论述了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对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出了部署和要求。

二、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

党的作风建设经历了 90 多年的历程，那么现在进一步探讨：90 多年来，我们党到底形成了哪些作风？如果今天公选干部，出一道考试题目，问：我们党现在到底有哪些作风？对此应该怎样回答？

可能多数人会答：三大作风。但我再念一下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大家看一看，我们党现在说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清正廉洁甚至艰苦奋斗等等，有没有在三大作风中出现呢？至少没有这样的字眼。那它们算不算党的作风呢？应该归纳到哪呢？

如果回答“两个务必”呢？我们党的作风是不是只有“两个务必”？当然不是。

所以，今天光是答三大作风，或“两个务必”，都已经不能涵盖党的作风的全貌了。

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内容非常丰富，但全会说这是作风建设的主要任务，还没有把它们概括为八大作风。后来，胡锦涛同志又说要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有交叉，但也不完全一样。

再查阅现行党章，虽然对作风建设提出了要求，但并没有集中概括党的作风的主要内容。所以，到底怎样全面地概括我们党 90 多年逐渐形成的全部优良作风，还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党要与时俱进，党的作风建设也要与时俱进。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作风作一些梳理、总结，还要随着时代发展，突

出培育和发扬富有时代精神的新的作风，从而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我希望到适当时候，党的文件能够对党的作风的内涵做一个新的界定。这样，如果问我们党到底有哪些作风，我们可以真正答得出来，而且能够答得准、答得清楚，更便于指导实际。

为了从整体上反映党的优良作风的全貌，我对 90 多年来党所强调和表现的作风做了一个整合，把它们分类概括为六个方面：1.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2.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作风；3.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作风；4.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作风；5. 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作风；6. 民主集中、团结和谐的作风。下面就逐个介绍每个方面的由来、内容、意义、实践和要求。

（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

1941 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释。1942 年，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成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1938 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45 年，在七大上，毛泽东同志作口头报告，讲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特别说明，马克思主义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七大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列为三大作风之首。之后，我们党一直强调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必然要求求真务实。毛泽东同志要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江泽民同志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求求真务实，少说空话，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

不搞形式主义。”胡锦涛同志 2004 年专门强调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90 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努力发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早在建党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很注意研究中国国情，并据以比较哪种道路和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比如，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将亚当·斯密的《原富》与孟子的思想进行对比，于 1915 年秋写了《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与？》一文。他概括说，国家适值存亡之秋，如何拯救中国，有的主张“必自正人心始”，有的则主张“国富则民强，民强则国斯兴”。周恩来提出，二者不可偏废，需折衷取之，孟子的“言义不及利，乃正人心之所本也”，亚当·斯密的“言利不及义，斯富国之左（佐）证也。”“二氏之说尽善”，但如果分而行之，只能“促吾国之亡”。

中国共产党从 1922 年党的二大起，就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指导和帮助，但也受到不正确的干预，造成过严重的损失。所以，后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这与毛泽东等同志实事求是、注重调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是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1 年 2 月，就写了 10 万字的《寻乌调查》和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第一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

事实也证明，什么时候不能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就会出问题。1958 年 11 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

“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不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但很遗憾，这种浮夸风并没有得到遏止。甚至浮夸到高产典型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计划发射“高产卫星”，一亩红薯 60 万公斤，一颗白菜 250 公斤，一亩小麦 10 万公斤，一亩皮棉 2500 公斤，违背了起码的

常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之所以能够进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推进，就是因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年来，干部队伍思想作风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弄虚作假。说假话、说空话的风气几乎成灾，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现象屡禁不止。社会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假冒伪劣，对老百姓造成严重危害。

诚信是维系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基础。十七大之后，我受中央派遣到美国和加拿大介绍十七大精神。与两国政要、智库、实业家等进行了大量交流。有一位美国专家评价十七大报告时，用了一个词：“诚实”。仔细一琢磨，有道理。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首先要诚实、诚信，要有良好的信誉。中国商品和倒爷在国外的经历，说明不诚信既害人也害己。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早就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对人对己都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用说假话来掩饰严重过失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都必须绳以党纪。”新形势下，必须重申这些要求。

求真务实，就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办事，做工作，总要有一定的形式。但形式只能为内容服务，不能为形式而形式。现在，很多地方，不恰当地滥用形式以装潢门面，导致形式主义成风。比如，开会，不是为了讨论和研究问题，而是为了履行开会的形式；领导讲话，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大多是写作班子起草的稿子，领导照念照背。

形式的完善掩盖了内容的空虚。几年前，我就多次说过，现在是各种形式越来越臻于完美，而形式主义也越来越达到极致。

针对形式主义的歪风，一定要倡导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对中央的精神，不能用讲话落实讲话，用报告落实报告，用文件落实文件。必须：细化、责任、督查。处理好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关系。谋划要有战略眼光，落实要狠抓细节。一定程度上，成败在于细节。

（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作风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90多年来，我们党在这方面陆续确立了几个重要的思想。

一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名言。此后，一直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二是“群众路线”。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①

三是“三个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是“执政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执政为民。说明党受人民的委托执掌权力，就必须受制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一切执政活动，都要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出发，把为人民谋取利益当作最根本的目的。

五是“以人为本”。人是我们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大能碰的老大难问题。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的位置逐渐提高。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都是靠的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支持、人民的奋斗。这一基本的事实，我们都非常清楚。反之，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国民党为什么败退台湾，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民心。

怎样坚持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根本的要用正确的路线、方略把国家治理好、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制定战略、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要煞住官僚主义的歪风。

我们党与官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63年，周恩来曾经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如：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主观片面，粗枝大叶；官气熏天，不可相迳；唯我独尊，颐指气使；不学无术，耻于下问；遇事推诿，怕负责任；上捧下拉，老于世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等等。他把20种官僚主义一一列名为：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争夺名利的官僚主义……等等。

官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今天的官僚主义，有的是历史上一直遗留下来的，也有的是新冒出来的。但要害，都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煞住官僚主义的歪风。

（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作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往往需要解放思想。从广义上来说，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狭义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再要求的，“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思想不解放，就走不出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来，也走不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

解放思想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所以，必须始终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与时俱进这个词。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公开使用了这个词。此后，“与时俱进”便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最流行的概念之一。2002年，十六大报告界定了与时俱进的内涵，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能否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都要富有创新精神。创新这个概念，邓小平同志用了四次。从1989年开始，江泽民同志逐步提出“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等一组概念。同时还相应地提出了“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国家创新体系”等要求。2000年6月，进一步把“创新”范畴引入党的建设领域，提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还突出强调了创新的意义，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胡锦涛同志还与理论创新相对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

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需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为什么会有真理标准的讨论？“文革”结束之后，中央集中大批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研究历史问题。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很多案件都搞错了。但如果平反，都遇到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很多案件都是中央批准的、毛泽东同志作了批示的。怎么办？是实事求是给予平反，还是坚持原来的结论和批示不改？这才引出了到底用实践还是用文件检验真理的问题。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下，1978年5月，《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就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便成为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

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禁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新道路的宣言书。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先后6次论述了市场经济问题。其中1979年的讲话，时隔25年才公开发表。到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才对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的总回答。

紧跟着，1992年6月9日，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结业仪式上，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问题，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到1992年10月，十四大终于庄严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10年后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两个《决定》标题只差一个词：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完善”。一词之差，浓缩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我们解放思想的过程。

（四）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作风

90多年间，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曾经非常艰苦，甚至难以想象。执政后，也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开始建设。为什么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从不向困难低头，自强不息，勇于拼搏。正是靠这样的作风和精神，我们才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个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171人，而牺牲、

遇难的有 42 人，占 24.5%。而当中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上职务的领导人共有 55 人，其中牺牲、遇难则有 15 人，占 27.2%。这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四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就有一个牺牲、遇难，每四个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也有一个牺牲、遇难。

四川巴中的通江县，当年曾是川陕根据地的中心。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前年，四川省委决定把散落在全县的红军烈士墓集中起来，建造了一座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我去参加了开园仪式。在一片山坡上，集中了两万多名烈士的坟墓和墓碑，极为壮观，只要到现场看一看，没有人不会受到极大的震撼。

又如西路军问题。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西路军 2.18 万人，在执行独立创建河西根据地并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中，遭到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又没有兵员和物资补充，孤军作战，顽强不屈，毙伤俘敌约 2.5 万人，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西路军英雄将士全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那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下表现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很多西路军女战士，遭受各种凌辱，其命运之悲惨，令人潸然泪下。

由于西路军遭受失败，并受张国焘问题的影响，幸存的西路军将士受过许多委屈。流落民间者，处境更加悲惨。即使解放后，长征老红军的荣誉也长期与他们无缘。很多人因那段失败的历史而受到审查，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但他们都忍辱负重，通过种种方式为党和人民工作。改革开放后，终于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前几年，兰州军区召开内部研讨会，讨论西路军精神问题。我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强调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战士是感动历史的英雄，西路军精神是感动历史的精神。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和他们的精神。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一个缩影。正是靠

着广大共产党员团结和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我们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力增强了，物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毕竟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仍然需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作风。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永远不能丢。

（五）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作风

早在 1926 年，中共中央就发出过第一个反对党内贪污腐化行为的文件。

1927 年 4 月，党的五大开始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委的历史从哪里算起？就是从五大。

几十年来，我们党不断同党内的贪污腐化等现象做斗争。改革开放后，进一步使用了“腐败”这个概念。针对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新情况，党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风建设的重点，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在反腐败斗争中，党和国家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靠教育、又靠法制的思路，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还逐步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十七大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为“反腐倡廉建设”，明确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八大再次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反腐败就必须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享乐主义是走向腐败的台阶。而奢靡之风，实际上已经是腐败，或者是腐败的环境和台阶了。

（六）民主集中、团结和谐作风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保持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征服困难，克敌制胜，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在组织上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形成了民主集中的传统和作风。

比如，1925年1月我们党召开了四大，中共中央事先于1924年8月31日向各地发了一封信，要求各级组织：“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种问题发表其意见，并于小组会议时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个人有特别意见者，指令其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据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就连远在莫斯科的中共旅莫支部，也给中央写来了专门的报告，不仅汇报了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情况，而且各种观点多少票、都详详细细记录在案。

在八大上，除了毛泽东作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之外，还有113人作了大会发言，70篇未刊发言。这些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像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就是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

历史事实也证明，党发生的重大失误，也无不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和破坏有直接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比如，文化大革命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

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人民代表大会从1957年起，没有能正常开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当时干部人数的17.5%，其中副部和副省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左”为主要特征的各种歪风邪气盛行一时。

现在，有一些人无视历史事实和党的决议，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甚至说中国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和坚持《历史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结论。

怎样发扬民主，不仅有很多政治性问题需要研究，也有很多技术性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很多今天看来都令人感到非常清新甚至非常生动的内容。如决议中有一部分是：怎样使党员对开会有兴趣。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很深入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党员对会议兴趣少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调开会前要做充分的准备，在会议上要展开充分的讨论，要解决实际问题，要引导群众有针对性地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对于中间突然插进来的其他问题和发言要妥当地引导，不要限制讲话。毛泽东同志8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现在恐怕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开会是有必要的，但怎么防止现实主义、切实解决问题？这就是多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改进的会风问题。

如何保持团结和谐，是实行民主集中制需要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党中央要求，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党内和谐，是以党内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党内关系的和谐，主要包括思想和谐、组织和谐、行动和谐。

保持民主集中、团结和谐，特别要注意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维护团结和谐，除了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外，还要注意思想政治问题。要认识到，团结出生产力，团结出干部，团结出好心情。营造一个良好环境，有利于个人进步，有利于身心健康。要认识世界的多样性，能够容人，善于共事。人要聪明，但不要太精明。要豁达大度，不要

斤斤计较。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肯定别人的成绩，多给别人以鼓励。领导之间要善于沟通。办事要按照各自权责和程序，该报告的要报告，该协商的要协商，该征求意见的要征求意见。

维护团结和谐，也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强团结的一个有力武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作风。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有义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违纪的事实。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

现在，党内生活中庸俗风气不可忽视，一些人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不敢批评。“批评领导怕遭打击报复，批评同级怕影响关系，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丢面子。”结果是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盛行，严重影响团结和工作。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允许本人申辩；讲真理，不讲面子；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达到既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

除了上面概括的六个方面的优良作风外，90多年来，我们党还培育形成了许多富有内涵和特色的各种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等。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坚定信念、救国救民、敢于斗争、勇于探索、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严守纪律、维护团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建设国家、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等。主要内容可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敢闯新路、开拓创新。

所有这些精神，都与作风密切相关，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反映和体现。

三、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是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从思想理论上深刻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加深对于人民群众的感情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英雄安泰，天下无敌，他获胜的奥秘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也就是往生他养他的母亲地神盖娅身上一靠，立刻获得了新的力量。敌人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便设法把他举到空中，让他无法再靠近地面，结果在空中将它扼死了。斯大林在引用了这则故事后说：“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99页）

这则故事很多人都熟悉，但不知是否注意到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定位——人民是布尔什维克的母亲，布尔什维克是人民的儿子。这里对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定位，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党是人民的儿子，人民是党的母亲。我们常说党与人民群众是“血肉联系”，什么样的“血肉联系”？就是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无产阶级的政党，负有组织和领导群众的责任，但归根结底，只是人民的代表和公仆。我们所有的党员和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应该就是对自己母亲的感情。胡锦涛同志说过：领导干部“要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主义、当亲人、当老师”，要“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下大气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

（二）正确认识国家权力的来源，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

当年，有个美国记者曾问毛泽东同志：“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同志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根据这种人民主权的思想，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开始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党受人民委托执掌国家大权。这种权力，来自于人民，归根到底属于人民。我们仅仅是代表人民行使这种权力，因此，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在权力问题上，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认识：

一是正确认识权力是从何而来，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归根结底是掌握在人民手里的。

二是正确认识权力是为谁所用、用来干什么的？按照权力授受关系，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

三是正确认识权力是受到监督的，随时随地都有无数的摄像头在记录着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

四是正确认识权力不是永恒的，是会随时被收走的。党的权力会被收走，个人的权力当然更是会被收走。

有些掌握了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对权力的认识严重扭曲。某市委党校曾对卷入腐败案件的干部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人往往存在着“私权”意识，有的干脆说，权力是自己“苦心积虑得来的，千辛万苦挣来的，劳民伤财换来的”。甚至是“自己花钱买来的”。所以，一旦权力到手，就要捞回成本，还要赚上一笔。“多捞多得，少捞少得，不捞不得”。这种认识是他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教训值得所有干部记取。

（三）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不仅应该一切为了人民，而且应该一切依靠人民。改革开放的实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80年代人们很熟悉的一个

词：“松绑”，即把人民群众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十七大报告有 11 处用到“主体”这个词，其中 4 处讲到人民的主体地位，一处讲到党员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十八大报告也有 12 处用到了“主体”这个词。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都要首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要求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很多地方开设政务论坛、市民论坛、各种各样的听证会等，都是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如定期从市民中征集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筛选，一个时期抓住一个特殊的问题，在网上或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征集愿意提出见解的人。报名之后，以适当的什么方式选择市民代表。以后就由市长、副市长直接和市民代表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话的情况还通过电视或其他媒体转播，老百姓都可以看，也可以参与。各地还普遍实行了听证会制度，有关部门举办过好多了，关于水价问题、关于电价问题、关于火车路费问题等等，总的效果还是好的，标志着我们在怎么运用权力、管理社会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四）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随着经济成分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客观存在，因其冲突而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增加，错综复杂。作为国家、政府和执政党，不能只代表一部分人和群体的利益，也不能哪个人叫得响就解决这个人的利益。对各种意见和要求要善于分析，辩证看待，从整体上把握。因此，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促进政党

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方法则是统筹兼顾。抗震救灾，矿难救援，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都充分显示了统筹兼顾的重要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大事、办快事、办难事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在这种统筹中，我们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坚持原则与适当照顾的关系、政府扶持与自主发展的关系，努力整合全体利益，兼顾各方利益，真正代表好、发展好、分配好、实现好、维护好各方面的利益。

（五）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提高群众工作的实际效果

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随着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随着国际间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影响群众思想和行为的因素与渠道越来越复杂多样。深刻认识和把握这种新变化，不断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做好群众工作，要有恰当的方式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群众运动、思想教育、宣传动员、典型激励、批评与自我批评、访贫问苦、蹲点调查、对口帮扶、创先争优等一系列方式方法，总体上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些方式方法，产生于不同的时期。所以，运用这些方法，需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有些方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行、有效，但时代条件变了，就不能简单照搬。如群众运动，在大规模革命时代，效果非常明显。但后来照搬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就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后果。特别是当今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

的老办法不能用了，但新的办法是什么？尚缺少经验。即使有了一些新办法，有的同志还不一定会用。

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大胆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要努力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提高群众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既要继承好的传统，更要不断改革创新。

比如，要充分认识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今天已经不是计划经济年代，不能再用经济和超经济强制的手段来控制群众，人民的生存权利已经主要由自己掌握。执政党的工作重点不是管控群众，而是服务群众，引导群众。

要充分认识当代群众的新特点：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对政府和干部要求越来越高。领导干部更多地要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

要充分认识与群众关系的新位移：不再是你听我说，我指示你接受的关系，必须体现平等精神，必须更多地采用讲道理的方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迅速发展。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发展，既给群众工作带来了挑战，也给用现代手段做好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如，互联网在党委、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要关注互联网上的公众言论。领导人要注意上网了解公众意愿，也可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要尽可能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

四、总结经验，综合治理，把作风建设落到实处

作风建设问题，可以说是：老话题，新要求，硬骨头。

90多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问题，几乎无数次强调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也开展过多次运动或几次教育活动，但到现在依然任重道远。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作风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历史的经验证明，作风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是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与整体社会的环境和氛围，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体制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领导干部的素质及其政治、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把作风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采取多种措施，整体推进，标本兼治，从严要求，突出重点，真抓实干，落到实处。特别是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社会运行机制，从根本上改善作风建设的基础

面对作风问题特别是腐败现象，有人羡慕 50-60 年代的那种社会状况，认为整体社会今不如昔。其实，当时社会之所以没有现在这么多作风问题，某种意义上是由当时的“超稳定”机制和状态决定的。虽然社会消极面不多，但社会的活力也严重缺乏。今天，我们加强作风建设，不可能回到当年那种“超稳定”状态去。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社会的动力机制已经有很大改善，社会的活力也已经大大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和成果，不能轻易否定，更不能倒退。

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社会已经形成的动力和活力，而是辩证地认识和对待这种动力、活力。充分认识在市场机制下激发起来的动力，有着天然的两重性。

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一方面，继续鼓励和发展那种朝着真善美方向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另一方面，又加大对动力机制的规范、对利益驱动的约束、对违法犯规行为的打击、对守法行为的鼓励、对先进道德的弘扬，逐步将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和行为限定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

这就犹如加强公共交通以及交通规则的建设。既积极发展先进的交通工具，鼓励人们享受先进文明的便捷和乐趣，同时又把所有的交通行为都限制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坚持红灯禁，绿灯行。谁违反规则，谁就要受到处罚。坚持不懈地进行这样的规范和教育，人们的文

明素质就会逐步提高，对法律和道德的权威就会更加敬重，社会的动力和活力也就会越来越多地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二）把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我们党历史上，比较明确地称为整党和整风之类的运动或活动，已经开展过不下 10 次。它们是：1. 1941-1945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2. 1947-1949 年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3. 1950 年的整风和 1951-1954 年的整党；4. 1957 年的整风运动；5.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整党；6. 1968-1971 年的整党建党；7. 1983-1987 年的整党；8. 1998-2000 年的“三讲”教育；9. 2005-2006 年的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10. 2008-2009 年的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

回过头来看，这些运动或活动，有的是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的是总体成功但局部有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教育活动，由于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导思想正确，方法也比较好，所以总体上是成功的。

这些情况说明，在党的路线和指导思想正确的情况下，适当开展集中教育，是必要的、管用的。开展集中教育，有助于加强教育、监督、管理和查处的力度，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解决某些突出的问题。但如果在某一时期，党的路线和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开展这种运动或活动，一般就难以收到积极的效果。实践还告诉我们，即使成功的活动，在开展过程中，也要掌握政策、注意方法。集中教育后，要注意形成长效机制，在平时继续加强管理和教育。

（三）加强制度建设，为改进干部作风提供坚强保障

重视制度建设，是我们党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以后取得的深刻认识，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作风状况与制度、体制的完善与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制度

和体制，能够激励和诱导不同的行为方式。

所以，我们的作风建设要落到实处，反腐倡廉要抓住根本，必须标本兼治，着重在改善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堵塞漏洞，消除弊端，形成能够遏制不良作风的激励和导向机制。

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调整资源和利益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和领导干部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减少繁琐的程序和手续；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任用、提拔、监督的各项制度，防止干部考察中的失真失察现象；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制定严格的规范，加大查处的力度，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加强道德人品修养，提升领导干部自身素质

作风建设，既需要外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也需要自身的内部修养。自我批评，就是一种修养的方法和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看待和评价一个人，最常用、最基本的标准，莫过于“人品”两个字了。能被老百姓称为“好人”，是很不容易的。这里的“好人”，不是指“老好人”。好人也不等于好党员、好干部。但从道德品质这个方面来说，党员干部，一定应该是个好人。只有首先做一个好人，才能真正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如果做不好人，就肯定做不好一个党员和干部。好人为什么“好”，就是他的人品好。近年来，我一直鼓吹，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应该引入“人品”这个概念，着力加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人品建设。

其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我的修养要则》、《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重要文章中对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相当程度上涉及到人品问题。传颂至今，经久不衰的名言——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说是对共产党员道德境界和人品修养的最高要求。

人品要进行修炼。中国历来有强调自我修养的传统。“吾日三省吾身”，“慎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很注重自我修养，常用这样的语言来激励自己。

要鼓励党员和干部以“慎独”的精神要求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声誉，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经常自觉地反省和检查自己的行为，一旦发现问题，就要立即加以纠正，不断警示和告诫自己。

对金钱之类要有正确的认识，要看得开一点，甚至不妨唱唱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有一个被查处的干部收受贿赂 400 余万元。在看守所见到记者时，给自己算了七笔账：家庭账、人情账、收入账……可惜的是，这些账是在进了看守所以后才算清楚的。如果在这之前就好好算一算，何至于落此下场？我们每一个干部平时不妨多算算这种账。

所以，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要守住法律底线，这其实不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最高标准，而实际上是最低标准。守住了，就不会出那么大的问题。

（五）奖惩结合，赏罚分明，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环境氛围

现在有些地方，送礼送钱成了风气。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好人如果不想同流合污，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逐渐地好人也就变坏了。

所以，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形成科学、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鼓励、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发挥先进性的良好环境，鼓励人们当正派的人，而不要当坏人。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怎么用人。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就说过：“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实际上，从用人的机制和效果看，排斥一个正派的人，就会有十个正派的人消失；使用一个不正派的人，就会有一百个不正派的

人冒头。如果用干部不是看政治、看品德、看才能、看政绩，而是看关系、看后台、看幕后的功夫，虽然程序也走了，形式也到了，但实际上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程序和形式，并没有真正选用该用的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干部风气的蜕化，挫伤很多正派人、能干人的积极性，鼓励和助长溜须拍马、拉帮结派的歪风邪气，就会从根本上影响党的工作和事业。

所以，一定要掌握用人的标准和导向。把作风建设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通过健全完善科学的机制和制度，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永葆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当年，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希望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50余年的考试，我们党考得怎么样？应该说，是合格的。但，这场考试并没有结束，而是还在继续。如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我们在这场考试中必须继续思考和警醒的重大课题。只要我们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我们党就一定坚如磐石，兴旺发达。让我们为此而共同努力。